

青年漢木

費孝通題



推己及人

(下)

TUIJIJIREN

费孝通著

费孝通(1910.11.2~2005.4.24)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汉族，江苏吴江人。

自己及人
世界通

青年漢木

青年題



推己及人

(下)

費孝通著

TUIYIJIREN

大眾文學出版社

目 录

· 记人篇 ·

物伤其类

——袁云逵 1

一封未拆开的信

——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6

“爱的教育”之重沐

——振华女校四十周年纪念献给校长王季玉先生 10

悼锡德兰·韦柏先生 13

院与时代俱逝的鲍尔温 18

圣雄甘地 23

郑兆良和积铁 27

信得过的人

——忆吴晗同志 34

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 37

缅怀肯尼雅塔 42

悼福彭 47

“严伊同学” 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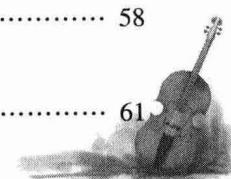
悼愈老 53

纪念《文汇报》的女将 55

缅怀福武直先生 58

在人生的天平上

——纪念吴泽霖先生 61



2 推己及人

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65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75
人不知而不愠	
——缅怀史禄国老师	80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追思楚图南同志	92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96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98
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姐	102
推己及人	105
爱国学者的一代人	
——怀念曾昭抡先生	109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112

· 读书篇 ·

读赫尔回忆录	115
读张菊生先生“刍蕘之言”	120
旧话相应	
——“柳无忌散文选”书后	127
潘、胡译《人类的由来》书后	132
重刊潘译《性心理学》书后	138
青春作伴好还乡	
——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而写	145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读《蚕丝春秋》书后	157
《史记》的书生私见	161
旅途读巴金《随想录》	164



· 治学篇 ·

真知识和假知识

——一个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自白	167
从小培养 21 世纪的人	172
关于教育的思考	181
开风气 育人才	187
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	197
孔林片思	200
我对自己学术的反思	
——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一	204
跨文化的“席明纳”	
——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	212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	219
决心补课	225
简述我一生的写作	228
科教兴国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232

· 随笔篇 ·

杜鹃与杜甫	233
植物学家龚自珍	235
林则徐小传	
——为《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纪念邮票而作	237
其报其人	
——祝贺香港《大公报》复刊四十周年	239



· 游记篇 ·

洞庭纪游	241
游滕王阁小记	245
访天一阁	249
游青海湖	251
为西湖不平	254
为西湖一文补笔	257

· 论美国人的性格 ·

美国在旅程的尽头

——美国人的性格之一	262
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美国人性格之二	267
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美国人性格之三	271
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美国人性格之四	275
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美国人性格之五	279
蛮一点·孩子!	
——美国人性格之六	283
道德上有个毒刺	
——美国人性格之七	288
负了气出的门	
——美国人性格之八	293



附:关于美国人的性格

——通信 297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 299

有关自己的反思

——费孝通先生回答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的
访问(节录) 316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365



关于教育的思考

关于教育这个课题，我想了很久。我常常感觉到世界变化太大了，自己赶不上去，现在情况的变化很少有人能预先说得很清楚。我们正逢着一个不但是我们中国，也是世界的大变动时期。我们做事情总得要从全局出发，看看我们自己应当怎么做工作。今年初，《群言》编辑部的同志要我写几句话。我说，我们要“脚踏实地，胸怀全局”。“脚踏实地”，是说每个人有自己的岗位工作，要明白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第二步要“胸怀全局”。我们的眼光要放开一些，要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什么时期，才能说我们应当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观点。1989年教委要我去参加一个国际婴幼儿教育讨论会，我写了一篇文章《从小培养21世纪的人》，后来在《群言》杂志上发表，假如各位有兴趣可以翻出来看看。我们这个时候就应当想到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21世纪离今天只有七年，一转眼就到了。现在假如不想一下，21世纪是什么样的世纪。我们怎样培养一批将来要负责任为人类做事情的人呢？这句话没说几年，世界已大变，一个旧的秩序已告终，新的秩序还没确立，现在正是青黄交替之际。

20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想大胆地说，大概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期。我是20世纪初出生的，到现在八十几年，我碰到两次大战，在20世纪前还没有过。世界大战是20世纪的特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这是一个问题。新世纪与旧世纪有何区别？全人类发展的过程，总的来看是从很小的群体逐步扩大为一个相互依赖的集团，一直到现在，全人类已经互相离开了，人与人绑在一起了。

今天佛山市的同志跟我说，佛山市正在争取在综合实力上登上全国榜首，它的发展真是快得很。为什么发展那么快呢？因为我们进入了世界经济，外资进来了。佛山市山深老虎多，顺德、南海都是小老虎。去年我去过顺德，写过一篇《珠江三角洲的再认识》。小老虎怎么出来的呢？因为我们进入世界经济，



越来越深，越是靠得拢，发展也就越快。

我接待过一个前苏联来的代表团，其中一个代表是“太空人”。他问我：“人类在地球上还能住多长时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有个环境保护问题，人类在地球上是不是总可以住下去呢？他提出的事实上是一个已经为人注意的环保问题。这就表示他是从全局看问题。小平同志讲了很多，他是针对我们中国在世界所处的时代，提出机遇难得啊！什么机遇？他是从全局里看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有全局观点，要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现在两霸的对立局面结束了。曾经有一段时期，美国人以为美国世纪来临了，就是说它要做秦始皇了，要统一全世界。接着来了一个海湾战争。靠了科学发达，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战争的目的。阿拉伯世界还是乱成一团。接下去我们又看到，过去一年里：西方世界经济萧条。以增长率讲我们中国是最快的了，我们是12%，人家都不敢相信。当然我们起点低，但是经济确实在发展，虽则发展的速度不平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发展速度我说至少也在30%以上。

这次人大闭幕之后，我就出来跑，到现在没停。我到了新加坡，是新加坡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去讲讲中国的发展，人家已经注意到中国农村发展主要是靠乡镇企业。

新加坡只有两百多万人，弹丸之地，没有我们北京市大。但它能成为一条小龙，有它的本领。他们说，新加坡的飞机，在六小时可以达到的距离内，其资源都可以为它所用。这话怎么说呢？他们请我吃饭，第一道菜是豌豆苗，我说这很好吃嘛，我们家乡也有呀。他们说，这是你家乡的嘛，昨天到的呀。真的还是假的呢？真的。后来我到上海附近的太仓。太仓的豌豆苗，每日把它摘下来，运到上海，再上飞机运到新加坡。新加坡请我们吃的不就我们家乡的菜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有了全球观点。他们这两百万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有靠利用地球上其他地方的资源才能发展起来。这说明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了。

在这个时候，必须看到这个大变局。小平同志提出要开放、要改革。开放改革不是突然空想出来的，而是实际的需要。世界变到这个局面了，我们不去迎接，不去接轨，那我们就不可能发展。不发展怎么样呢？用“太空人”的



话说，中国人是不是还可以在地球上住下去。这几年，在小平同志号召下，大家看到，中国不能不改革开放了。现在是一个团结一致改革开放的局面。结果怎么样呢？现在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过其他地方，在制高点上了。怎么可能发展那么快呢？资金有个规律，流向利润高的地方，去增值。我们现在具备了条件，在世界发展最快的地方，适应资本的流向，只要我们保持安定（当然还要改善其他条件），资金就向这边流。

我最近访问过江苏的太仓，太仓现在农民很富，家里有酒吧，我们又注意到在这个家里我们没有看到一本书。这就要谈教育问题了。

处在经济战略的制高点，当然外资不求自来，形势好哇。可是形势大好，带来的问题也不少。已经富了起来的农民家里却可以一本书都没有！这种反差要认真研究。就是说，在经济发展高潮下，接下去应考虑配套的事情，教育工作者对此忧心忡忡。很多问题要配套，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知识问题，教育问题。

什么是教育？这个问题我已想了很久。八十多年了，我从幼儿园的娃娃到北京大学的教授，没离开过教育这条线，要问我什么是教育，我还是讲不清楚。教育工作者第一个问题要懂得什么叫教育，这话听来很怪。我自己也没有很深刻地想过这个问题，一辈子搞的什吗？书在教育里面起什么作用？现在不能不想一想了。

我们经过许多代积累下来的知识，这套知识要推陈出新地传下去，才算是教育。这是承前启后。刚生下的人什么都不懂，逐步懂得了生活的方式，懂得了与人相处合作，一直到有所创造，丰富生活的内容，这才算教育。一个人单靠遗传不能创造文化，需要教育。中国人很光荣，历史那么长，人口那么多，大家说一样的话，有一套共同的做人的态度。要把这一套东西传下去，适应新的时代。我们的任务就不仅要传，还要更新。我们的祖先没有碰到的问题我们碰到了。我们不能只靠祖先的遗产过日子。要变，需要创造，要尊重实际，目标在于创造。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创造，我去看了，把它写成文章，推广了。人民创造的东西，知识分子把它总结推广。市场经济的提出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农民的创造力是很丰富的。人民有创造力，知识分子要去总结推广。这里面也有个

教育问题。教育就是把有用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一代代传下去。

知识要不断更新。学的东西不能适应生活，那就不愿学了。我到太湖边调查，很多捕鱼人家的孩子不上学。我说，这样不对呀，怎么不上学？渔民说，去上学的话，将来去捕鱼不是要翻船吗？父亲教他哪里有鱼，碰到风浪怎么办，这一套是孩子需要的知识，书本里没有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捕鱼不行了。要养鱼，需要的知识很多，水的温度、种苗、饲料等。可是现在学校里不教养鱼，他就不去上学了，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教育和他的生活没有配合起来，这就成问题了。

这里还有个教育制度问题。我们的教育制度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是根据计划经济的格局来培养国营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当时是对的。可是他离开被分配的岗位，他的知识就不够了。大学分配制度是按计划经济的需要制定的。到了市场经济，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就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大问题。乡镇企业是什么人在搞呢？大学生分配不到那里，农民自己自学成才。我认识很多农民企业家，很成功，可是他离开他这个行当，他就碰到困难了。我去南通调查一个亿元村，书记说，开始搞乡镇企业，总是赔本，后来翻书，看到一种特种不锈钢产品，但不懂，就去上海找该书的作者，又去找研究院，得到他们的帮助，后来成功了，成了亿元村。书本知识变成了商品，它就值钱了。

我看到了这个村的情况，就在想，民盟里有很多有知识的学者，能不能把知识变成财富呢？也就是说，科技成果能不能成为商品呢？去年，无锡请了各个研究机关的人开讨论会，我听说要把科技知识与无锡的乡镇企业结合起来，欣然前往，并提出科技要有市场才能变成商品。苏南现在要提高的话，需要科技，而现在没有一个公开的科技市场。我在设想，民盟能否起这个作用，使科技成果真正落实到企业去，增加人民的财富。同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也能得到改善。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人民日报》1993年2月27日），党中央政策很明确，就是要使我们教育工作者、知识分子有机会能接触实际。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要服务于人民，做好事，办实事，应该在这方面发展。

最近，我的家乡有个建材集团在无锡开新闻发布会，在10天左右的时间

里成交六亿元！这是市场经济的结果。我看到消费有它的一定构成，先是吃饱，要粮食；要穿衣，就要发展服装；吃东西嘛，有蔬菜市场。可是现在要造房，就需要建材了，所以就发展了建材市场，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房子造好了，该买家具和用具了。现在很少人会想农民的房子应当需要什么家具和用具。我们应当及时正确的指导他们。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现在教育内容里最缺的是什么呢？我看就是我在学校读书时所说的德育。现在，特别是“文革”后，很少教孩子们做什么样的人。以至现在年轻的一代，不少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动摇。最近有不少电视剧反映了一代人失去了价值标准的信念。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知道要好好念书，好好为人家做点事情，自己要能独立生活，不要欺骗人，基本态度是有的。现在的年轻人伦理标准模糊了，甚至不要标准了，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现在要问一问，我们学校里从小教些什么，教师能否受到学生的信任。在大学里学生对老师的态度变化很大了，以前对老师很尊重，尊师重道。现在不是这样了。可以说，不仅仅我们中国，整个世界发生了危机。人和人已经在经济上绑在一起了，但是不懂得人与人怎么相处，民族之间怎样相处，国家之间怎么相处，仗着强权行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经济已经把全人类绑在一起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道德的观念和共同的做人的标准。假如人与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守则，那么这个世界怎么样呢？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要求有一个新秩序，一个新的大家能遵守的秩序。这个新秩序的基础已经有了，就是在经济上已经大家绑在一起，有了一个全球的经济秩序。可是能让大家接受的做人的基本标准却还没有树立起来。这要从小训练。所以我说，从大处讲，既要保持人类在地球上越来越繁荣，知识越来越多，科学越来越强。同时人与人相处必须越来越健全、和谐。我认为，21世纪要承受得住我们在经济上的发展，必须加强道德秩序的确立。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有这么长的历史经验，应当出来做个样子。周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看很好，要逐步确立一个共同的标准，而基本的做人标准，是能和平共处，能遂生乐业，能充分发展自己，对工作感兴趣，对生活感到舒畅，这是我们传统的基本精神。这种教育叫精神文明具体化，一定要我们来做。希望民盟的同志一起来想这个问题，主要的是自己以身作则，首先要形成一种风气，一种安定的、对生活事业有乐趣的、基本的



行为规范。要根据现在这么大的变化，发展自己，帮助别人，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子孙。

这是可以做到了，因为我们有传统，好的东西一定要发展起来，推陈出新。

以上是我出去跑了回来后的心里话，跟大家谈谈。民盟作为一个参政党，要让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落实下去，凡是看到的情况都可以反映，特别是教育方面，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向党中央反映。希望大家继续在教育方面多用脑筋，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尽我们作为一个参政党的责任。



开风气 育人才

今天我借这个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的机会，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十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会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后来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这江水的人在此驻足溯源，回忆反思。因之，我挑选这时刻说一些感想，和同人们一起鼓劲自励。

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怀有在中国人文科学的领域里开创一种风气的宗旨，在过去十年里，所里已经有不少年轻学者为实现这个风气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把这个风气带进中国来的，而且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吴文藻老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带头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学术方针中，有不少就是吴老师留下的教导。因之在吴老师逝世的十周年回顾一下他始终坚持的学术主张，对这个研究所今后的继续发展，应当是有用的，对同人们今后在学术领域里继续开拓和创造也是有益的。

吴文藻老师的生平和主要论述，在199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里已经有了叙述和重刊，我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从我个人的体会中捡出一点要点，略作诠释。

首先我想说的是吴文藻老师的为人，他在为中国社会学引进的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使他自己成为一代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不，这不是吴老师的为人。他着眼的是学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他在六十五年前提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当时改革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张。我在和他的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原有的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



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人才，人才，还是人才。人才是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本，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和宏扬！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吴老师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只有了解了六十五年前中国各大学社会学系的实情，才容易理解吴老师当时初次踏上讲台授课时的心情。正如前述文集的附录里“传略”所引用吴老师自己的话说，当时中国各大学里社会学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接着他深有感慨地总结了一句，“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

我是1930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有缘见到吴老师初次上台讲“西洋社会思想史”的一个学生。我从中学时就在教会学校里受早期教育，是个用舶来物滋养大的学生。吴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上留下了我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个印象说出来，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一定很难理解。我当时觉得真是件怪事，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回来，又是从小我就很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在课堂上怎么会用中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我当时认为是怪事的这个印象，在现在的大学生看来当时我会这种印象才真是件怪事。这件事正好说明了这六十五年里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这个变化不知耗尽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心血，但只有在这个变化的大背景里才领会六十五年前老师和学生的心态和他们在这六十五年中经历的苦乐。

现在来讪笑当时的“怪事”是很容易的，但如果置身于六十五年前的历史条件里，要想把当时的学术怪胎改造成一门名副其实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学，却并非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吴老师当时能做到的只是用本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史。这一步也不容易，因为西洋社会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要用中国语言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



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

六十五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这个人在当时的心情上必然已经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社会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了。

从六十五年前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现在看来必然会觉得自己很自然的事，不过是纠正在中国大学里竟要用外语来讲授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课程的怪事。经过了一个甲子，除了教授外文的课程之外，在中国学校里用本土语言来授课已成了常态，但是，社会和文化科学的教材以本国的材料为主的似乎还说不上是正宗。吴老师所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在目前是不是已经过时，还是个应该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宗旨，实质上是继承和发扬吴老师早年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

这个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国化问题牵涉到科学知识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问题。其实在大约六十年前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学生所办的《社会研究》周刊，就曾经展开过一番“为学术而学术”和“学术为实用”之争。尽管“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为了丰富人类知识而追求知识，固然也是一种不求名利的做人态度，有它高洁的一面。但是我在这场辩论中始终站在“学术为实用”这一面，因为我觉得“学以致用”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吴老师当时没有表态，但后来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介绍进来，为学以致用提出了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在功能学派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人类为了满足他们个人和集体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文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对人类的生活是有用的意思。人文世界就建立在人类通过积累和不断更新的知识之上。知识是人文世界的基础和骨干。学以致用不就是说出了知识对人是有用的道理了吗？用现在已通行的话说，学术的用处就在为人民服务。

吴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的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这门学科里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